

日本学界的海洋战略研究

——核心议题与研究趋势

朱晓琦

内容提要 在当前日本学界关于海洋战略的研究中,中国崛起对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影响、日本海洋战略中的武力建设、日本海洋战略与地区秩序构建、日本在国际海洋合作中的角色已经成为核心议题。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针锋相对的思想并存,是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主要特点。具体而言,地缘政治理论是当前日本学界海洋战略研究的主导性理论,权力转移理论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尽管相互依存理论曾经烜赫一时,如今却影响力有限。日本学界的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日本海洋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日本 海洋战略研究 中日关系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 朱晓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邮编:100872)

**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亚太地区形势演变及中国亚太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JZD049)。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王逸舟教授、张小明教授、宋伟教授的特别帮助与鼓励,《国际政治研究》邀请的匿名评审专家及中国人民大学邱静副教授、陈蔚芳博士,也对本文的修改和完善提供了宝贵意见。在此,笔者谨向他们深表谢忱。文中疏漏概由笔者自负。

2013年,日本内阁审议通过新版《海洋基本计划》,^①这标志着日本推出了新的海洋战略实施方针。此后,日本政府又通过海洋外交、对外装备援助等多种形式积极实施海洋战略。这一系列动作反映了日本对海洋安全的高度关切,也折射出日本学界对国家走向的思考与推动。日本学界曾于20世纪90年代掀起“海洋国家”研究的热潮,近年来对海洋战略的研究更加活跃,涉及海洋安全、海洋开发、海洋合作等多个领域。201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被中国超越,其排名退居世界第三。同年,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冲撞一艘中国拖网渔船,加剧了中日海洋领土争端。这些事件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进一步推动学界对海洋战略的思考。日本学者通过研究报告、学理争论、政策建议等诸多形式参与海洋战略的讨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日本海洋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在国内外现有研究中,探讨日本学界关于海洋战略研究动态的文章或专著并不多见。在日本,关于海洋战略的研究虽然成果众多,^②但专门探讨学界对海洋战略研究的特点、趋势等的文章相对较少。既有的相关研究更多的是通过回顾与梳理日本学者(如日本生态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梅棹忠夫、原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高坂正尧等)关于海洋战略的研究,分析海洋之于日本的意义,从而得出了“海洋是日本国家生存的根本条件”,^③“保护日本的海外通

① 日本内阁会议于2008年通过《海洋基本计划》,2013年又通过了新版《海洋基本计划》,作为未来五年日本海洋战略的基本政策方针。关于新世纪日本海洋政策方针的提出与调整,可参见朱晓琦、朱中博:《对日本新海洋战略的解读:以涉台问题为例》,《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6期,第71—82页。

② 这些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天児慧「キーワードは「現状維持」」、孫崎享編「検証尖閣問題」、岩波書店、2012年、110—116頁;天児慧「日中対立:習近平の中国を読む」、ちくま書房、2013年;高原明生「歴史を逆行させてはならない」、「領土問題」の論じ方」、岩波書店、2013年、33—44頁;田中明彦「アフリカ——日本外交にとっての課題」、「外交」Vol. 19、2013年5月、10—16頁;金田秀昭「中国の「戦略的海洋侵出」——グローバルに広がる「真珠の首飾り」——日本外交にとっての課題」、「外交」Vol. 19、2013年5月、120—125頁;秋山昌広「北極圏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の課題」、「外交」Vol. 22、2013年11月、20—26頁;秋山昌広「海洋の安全保障と日本」、「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亜紀書店、2014年、204—230頁;浅野亮「「グレーゾーン」のなかの日中関係」、「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亜紀書店、2014年、98—132頁;植木千可子「美中パワーバランスの変化と、日本の立ち位置」、「亡国の安保政策」、岩波書店、2014年、113—132頁;山本吉宣「パワーシフトのなかの日本の安全保障」、「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亜紀書店、2014年、16—57頁;坂元一哉「米国新戦略と日米同盟」、「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亜紀書店、2014年、79—95頁;船橋洋一、北岡伸一「積極的な平和主義と静かな抑止力」、「外交」第25号、2014年5月、84—102頁;菊池努「パワーシフトと東南アジア」、「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亜紀書店、2014年、187—202頁。

③ 川勝平太「文明の海洋史観」、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年。

商利益是幕末明治以来日本国家战略的根本目的”^①等结论。

在中国,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也为数不多。尽管当前中国学界在日本海洋战略研究领域的成果非常丰富,既包括海洋战略的总体构想、海洋战略对中日关系与美日关系的影响等宏观问题,又涉及海洋法制建设、海洋环境教育等海洋战略实施的具体领域,^②但是,关于日本海洋战略研究动态的成果比较有限。2005年,海洋政策财团向日本政府提出《海洋与日本:对21世纪海洋政策的建议》之后,一些中国学者曾对当时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背景、特点与影响进行考察。他们敏锐地注意到冷战后日本各界(政界、学界、媒体等)广泛参与海洋战略讨论、海洋战略研究显著增强的情况,指出海洋空间、参与国际海洋事务等问题业已成为日本学界研究的新热点。^③也有一些学者为了探讨日本海洋战略构想的内涵,对日本学界、智库、政府的主张进行梳理,从海洋安全保障、海洋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④还有一些学者旨在通过对日本海洋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探讨21世纪日本政府提出“海洋立国”的动因。其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初晓波认为,日本之所以积极推动“海洋国家”进程,是由于冷战后日本对国家身份的迷茫;^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廉德瑰则认为,日本海洋国家意识的思想根源在于“脱亚入欧论”“中日区别论”“中国威胁论”等。^⑥

① 北岡伸一「海洋国家日本の戦略—福沢諭吉から吉田茂まで」、防衛庁防衛研究所編『日米戦略思想の系譜:平成15年度戦争史研究国際フォーラム報告書』、防衛庁防衛研究所、2004年。

② 这些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张景全:《日本的海权观及海洋战略初探》,《当代亚太》2005年第5期,第35—40页;修斌:《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动向》,《日本学刊》2005年第2期,第37—52页;初晓波:《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90—103页;束必铨:《日本海洋战略与日美同盟发展趋势研究》,《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1期,第90—98页;金永明:《日本“国有化”钓鱼岛行为之要因:海洋战略与海洋法制概要》,《东方法学》2012年第6期,第113—118页;高兰:《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外交评论》2012年第6期,第52—69页;廉德瑰:《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李秀石:《日本海洋战略的内涵与推进体制:兼论中日钓鱼岛争端计划的深层原因》,《日本学刊》2013年第3期,第54—68页;吕耀东、李振广:《日本海洋战略构想及其对华影响》,《唯实》2015年第4期,第91—94页;陈拯:《海洋战略演进的日本经验》,《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24—33页。

③ 修斌:《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动向》,《日本学刊》2005年第2期,第37—52页。

④ 林賢参「日本の海洋戦略:シーパワーの視点から論ずる」,发表于2010年9月由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当代日本研究中心、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会议——“当代日本与中国大陆研讨会:台湾与日本学者的对话”。

⑤ 初晓波:《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90—103页。

⑥ 廉德瑰:《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

本文重点关注2010年以来日本学界^①在海洋战略研究领域最为关注的几个议题,进而探讨其研究趋势与影响。

一、中国崛起与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引起了日本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崛起”也被很多学者视为影响中日关系、东亚地区局势乃至国际秩序变动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些学者认为,中国崛起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还体现在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进而对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产生了影响。

(一) 中国崛起的影响

首先,日本学者高度关注中国经济的“崛起”。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浅野亮等学者认为,201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意味着“中国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财政收入增加,海上执法机构等行政部门的经费增长,用于海上巡航的船只数量也随之增长。^②

其次,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崛起”也体现在军事领域,包括转变军事战略、增强军事装备、强化军事防务等。第一,从军事战略来看,冷战后中国确立了“新军事战略”,解放军已实现了从“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变。中国在第一岛链以东的西太平洋海域,正在构建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A2/AD, Anti-Access/Area Denial)。威吓与遏制已成为中国海军的任务之一。一旦威吓失效,中国将从军事、政治、外交手段中选择最有利的方式迅速做出反应。^③ 第二,从军事装备来看,中国海军、空军力量正在急速增长。具体而言,远程地对地弹道导弹、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太空力量、网络技术等方面的战斗力

① 虽然本文的关注点主要是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但是日本知识精英在学界与智库的流动性较强,同时,原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会长、现东京财团理事长秋山昌广、原庆应义塾大学特聘教授、现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金田秀昭等智库研究人员的观点在日本海洋战略研究领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日本学界的海洋战略研究也颇具影响力。因此,本文也将个别具有代表性的智库研究人员的观点纳入讨论范围。

② 浅野亮「「グレーゾーン」のなかの日中関係」、「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亜紀書店,2014年,99頁。

③ 高原明生「歴史を逆行させてはならない」、「領土問題」の論じ方」、岩波書店2013年,34—36頁。

增强。^①第三,从军事防务来看,中国海军不排除使用武力解决岛屿争端。中国舰队在东海、西太平洋的巡逻正在趋于常态化。具体到钓鱼岛,中国在该地区海域的巡航频率、时间均有所增长。中国在南海与东南亚国家存在海洋领土争端,在东海与日本存在海洋领土争端,但由于东南亚国家相对日本力量较弱,中国以往主要关注南海海域。然而,近年来中国关注的焦点从南海转向东海,这种转变正是中国国家实力增强的体现。^②

再次,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崛起”还导致了中国外交环境与外交政策的变化。第一,“中国崛起”影响了近年来的中日关系。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教授天儿慧认为,当前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是规模增大、多样性增强、复合性增强。^③原庆应义塾大学特聘教授、现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金田秀昭认为,中国正在发展海洋霸权,这是导致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急剧恶化的主要因素之一。^④第二,“崛起”的中国正在通过海洋外交拓展全球影响力。这种观点将海洋视为中国拓展其全球影响力的主要媒介,认为当前中国的目光已超越了亚太地区,在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等地的全球性影响正在增长。^⑤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不仅通过“珍珠链”(String of Pearls)战略在印度洋沿岸构筑了海外活动的据点,还通过在西非、太平洋岛屿国家、中南美洲和北极地区养殖新的“珍珠”,在亚欧大陆边缘地带之外的海洋地区拓展全球影响力。^⑥

也有一些学者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情况,指出中国当前仍然面临各种难题。例如,浅野亮虽然肯定“中国崛起”是导致中日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但他也赞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观点,认定目前中国缺乏提供国际性公共产品的“能力”(Power),^⑦尚未成为一支全球性力量,而仅仅是地区性力量(Partial Power)。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当前中国在深海与远洋的发展并不顺利,特别是在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占领南海部分岛屿,在日本推行钓鱼岛“国有化”政策的背景下,中国的“海洋公务船”数量不足,^⑧很难在

① 金田秀昭「中国の『戦略的海洋侵出』——グローバルに広がる『真珠の首飾り』——日本外交に与っての課題」、『外交』Vol. 19, 2013年、125頁。

② 高原明生「歴史を逆行させてはならない」、34—36頁。

③ 天兒慧「日中対立:習近平の中国を読む」、ちくま書房、2013年。

④ 金田秀昭「中国の『戦略的海洋侵出』——グローバルに広がる『真珠の首飾り』——日本外交に与っての課題」。

⑤ 浅野亮「『グレーゾーン』のなかの日中関係」、100頁。

⑥ 金田秀昭「中国の『戦略的海洋侵出』——グローバルに広がる『真珠の首飾り』——日本外交に与っての課題」、125頁。

⑦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3.

⑧ 浅野亮「『グレーゾーン』のなかの日中関係」、99頁、104頁、129頁。

领土争端中应对自如。

（二）权力转移对日本海洋安全政策的影响

“中国崛起”还引发了日本学界关于在国际秩序变革过程中日本海洋安全政策走向的讨论。权力转移理论成为他们考察国际形势、设计日本海洋安全政策的主要理论工具。总体来看,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思路。

第一,当今世界的权力转移发生在地区之间。具体而言,就是从大西洋地区(美国)转向亚洲太平洋地区。东京财团理事长、原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会长秋山昌广将权力转移的发生归因于亚洲大国的兴起。随着拥有庞大人口数量和广袤国土面积的中国和印度作为新兴国家出现,以亚洲为中心的权力转移开始出现……在世界安保体系中,尽管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体系将长期存在,然而,随着美国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的相对下降,其权力将会衰落并向中国与印度方向转移……未来的权力中心将是以太平洋、印度洋为中心的亚洲海洋。^① 还有学者认为,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将进一步带动印度洋地区的发展。正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原所长田中明彦所指出的那样,“如今的世界体系,已经进入了权力转移时期……亚洲太平洋的经济增长带动了南亚、非洲地区,刺激了包括非洲在内的印度洋沿岸地区的经济增长”。^② 可见,这些秉持权力转移发生在地区之间观点的学者,侧重分析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得出国际体系将从“单极”结构向“多极”结构发展的结论。因此,他们呼吁日本应当积极应对国际秩序的新变化,与新兴国家建立密切关系。例如,进一步与东南亚、南亚、大洋洲、非洲等地区的国家拓展海洋经济合作,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开展防卫交流与合作,共同开展反海盗行动等。^③

第二,当今世界的权力转移发生在国家之间。其中,又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当前的权力转移发生在美中两国之间。早稻田大学教授植木千可子指出,美国是已经完成权力扩张的一方,中国则是将要进行权力扩张的一方。虽然美中双方的实力正在日益接近,但是两国在军事力量、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差距还将持续存在,“权力转移”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中国的实力上升,

① 秋山昌广「海洋の安全保障と日本」、「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亜紀書店、2014年、211頁。

② 田中明彦「アフリカ——日本外交にとっての課題」、「外交」Vol. 19、2013年、10—16頁。

③ 坂元一哉「米国新戦略と日米同盟」、93頁。

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干预能力将与中国的反干预能力相对抗,那么美国将以美日、美韩、美澳同盟为基轴,通过东盟等各种形式的安全保障框架,使中国在较长时间内遵循现有的机制。^①可见,在植木千可子看来,短期内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比较有限。另一种观点认为,权力转移不仅发生在美中两国之间,还发生在日中两国之间。新潟县立大学山本吉宣教授认为,当前的权力转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美中之间的权力转移,二是随着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在中日之间也出现了权力转移,从而导致了日本安全保障的复杂性增加。^②这些秉持权力转移发生在国家之间观点的学者,侧重分析新兴国家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得出了依靠结盟稳定国际秩序的结论。

在日本学界看来,依靠同盟应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确保日本的海洋安全。一些学者从日本自身的战略需要出发,呼吁强化日美同盟。他们指出,海洋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大动脉和资源宝库,是经济竞争与军事竞争的舞台。^③为了应对国际秩序中的权力转移,日美同盟不仅要共同应对中国海军力量的增长,还要在世界范围内共同推动“自由与繁荣的秩序”的形成。^④也有一些学者从日本面临的外部机遇出发,呼吁强化日美同盟。山本吉宣认为,强化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保障最重要的议程之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应通过增加防卫费等方式积极分担责任。日美双方在操作层面、战略层面均应建立密切协调的机构。^⑤然而,国家间同盟并不必然带来和平,也有可能导致战争。日美两国根据各自的利益需要强化同盟,共同“遏制中国”,极易引发“安全困境”,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从而可能“引起对抗、恶化冲突”。^⑥

① 植木千可子「美中パワーバランスの変化と、日本の立ち位置」,『亡国の安保政策』,岩波書店、2014年、113—132頁。

② 山本吉宣「パワーシフトのなかの日本の安全保障」,『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垂紀書店、2014年、46頁。

③ 浅野亮「『グレーゾーン』のなかの日中関係」,98頁。

④ 坂元一哉「米国防略と日米同盟」,『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垂紀書店、2014年、92—93頁。

⑤ 山本吉宣「パワーシフトのなかの日本の安全保障」,45—46頁。

⑥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同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页。

二、日本海洋战略中的武力建设

日本将如何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确保海洋安全？日本学界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部分将聚焦学界对日本武力建设的探讨，从自卫队建设与运用、联合训练与武器输出、海外军事活动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自卫队的建设与运用

首先，利用日美同盟推动自卫队的建设与运用。在战略层面上，增强日美双方的军事互信。一些学者担心奥巴马政府推行与中国“融合”的政策会给日美同盟带来负面影响，主张改善日美双方沟通不充分的状况，^①增加同盟互信。^②为此，他们支持安倍政府通过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与深化日美同盟，期待更有效地发挥日本对美军的后方支持作用。^③在操作层面上，有学者呼吁在保障驻日美军基地的基础上，实现自卫队与美军的直接合作，进而推动日美军事一体化，具体如下：第一，确保驻日美军基地的存续。解决普天间机场问题，^④推动基地租用协作的合理化，确保冲绳作为“美军要塞”的作用；第二，实现自卫队与美军的直接合作。具体而言，就是实现从“物与人”的合作变为“人与人”的合作，也就是由原来日本单纯为美军提供基地、资金，转变为自卫队与美军的直接合作。^⑤通过增加日美联合训练的数量、提升联合训练的质量，^⑥逐步建立对等的同盟关系；第三，推动日美军事一体化。一些研究者认为，日本海上自卫队需要依靠美军的协作才能发挥作用；同时，美军也需要海上自卫队的配合。因此，日美双方海上军事力量的统一运作极为重要。^⑦还有一些学者指出，自卫队与美军的一体化，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前提。因而，他

① 高原明生「中国「防空識別圏」の狙いは何か」、『外交』Vol. 23、2014年、78頁。

② 川上高司「集团的自衛権と日米同盟の壁——安保条約改定という不可欠な難題」、『外交』Vol. 21、2013年9月、123頁、124頁。

③ 細谷雄一「集团的自衛権と日米同盟——同盟はどのように強化されるのか?」、『USJI Voice』Vol. 8、2015年。

④ 坂元一哉「米国新戦略と日米同盟」、94頁。

⑤ 坂元一哉「日米同盟の難問「選歴」をむかえた安保条約」PHP研究所、2012年；西川吉光「日本の外交戦略：歴史に学べ海洋国家日本の進路と指針」、晃洋書房、2012年、162—163頁。

⑥ 秋山昌広「海洋の安全保障と日本」、227頁。

⑦ 同上。

们支持日美双方在行动方案设计、训练与演习、军事基地使用、情报共享与情报合作等方面加速一体化进程。^①例如,在岛屿防卫方面,通过自卫队与美军密切配合,形成在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笔者注)等防卫中对中国强有力的遏制,^②共同阻止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通过武力改变现状,进而阻止中国在东亚海域自由行动;^③在保障海上安全通道方面,共同开展“反海盗、扫雷等保卫海上通道安全的活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开展反恐活动”。

其次,通过自身的努力加强自卫队的建设与活动。日本国际大学前校长北冈伸一指出,虽然谈到日本的安全保障,常提及强化日美安保,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强化日本自身的力量。^④具体而言,就是要增加自卫队经费,积极承担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责任,配合美国遏制中国走向海洋、对抗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A2/AD);^⑤与此同时,要增强自卫队的战斗能力,确保日本的安全,同时也避免未来可能的中美冲突对日本造成的影响。^⑥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强烈反对使用武力。他们主张通过外交方式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发挥国际法、国际组织等国际机制的影响力阻止战争。面对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冲绳大学名誉教授新崎盛暉通过回顾历史指出,在尖阁诸岛^⑦问题上不仅要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还必须要考虑当地民众的生活。日中两国应搁置传统的“固有领土论”,和平解决领土争端。^⑧早稻田大学教授最上敏树进一步指出,为和平解决争端、避免使用武力,应通过国际法解决争端。^⑨值得注意的是,秋山昌广也在其文章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但是,在日本“新海洋战略的实施”构想中,他将“国际法秩序”列于“海上自卫队力量的远方便

① 高作正博「徹底批判!ここがおかしい集团的自衛権:戦争をしない国を守るために」、合同出版、2014年、91頁、92頁。

② 川上高司「集团的自衛権と日米同盟の壁——安保条約改定という不可欠な難題」、127頁。

③ 植木千可子「美中パワーバランスの変化と、日本の立ち位置」、113—132頁。

④ 北岡伸一「『積極的平和主義』の実践に不可欠な司令塔——縦割り安保を排して」、「外交」Vol. 23、2014年、86頁。

⑤ 山本吉宣「パワーシフトのなかの日本の安全保障」、46頁。

⑥ 中西寛「2010年代世界と日本の位置——文明論視角から」、71頁。

⑦ 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笔者注。

⑧ 新崎盛暉「国家固有の領土から、地域住民の「生活圏」へ——沖縄からの視点」、「『領土問題』の論じ方」、岩波書店、2013年、34—36頁。

⑨ 最上敏樹「来るべき和解のために——本旨は紛争の平和的解決である」、「『領土問題』の論じ方」、岩波書店、2013年、59—70頁。

用”之后,^①这表明,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不是国际法而是武力。

(二) 联合训练与武器输出

为了确保海洋安全,很多学者主张日本与海上通道的沿岸国家开展防卫合作,也即加强联合训练与武器输出。具体如下:

首先,与亚太地区国家加强防卫交流,开展联合训练。例如,京都大学教授中西宽呼吁:日本应当推动包括强化地区安全保障机制在内的亚太地区多边秩序,特别是通过防卫装备、技术合作、共同训练等方式密切与东南亚各国、太平洋岛屿国家及印度等国的关系。^② 大阪大学教授坂元一哉也支持日本与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展防卫交流。^③

其次,放宽出口管制、增加武器输出。坂元一哉赞同日本政府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形式支持那些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例如,向菲律宾提供大型巡视船,支持其在南海领土争端中与中国进行对抗。秋山昌广支持对印度武器出口。他认为,在已修改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又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基础上,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之后,日本也必须考虑大幅放宽或豁免对印度的武器出口限制。^④

(三) 海外军事活动

为了确保海洋安全,日本学界大力倡导自卫队的海外军事活动,主要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开展自卫队的远洋活动等方面。

首先,为自卫队的海外活动清除法律障碍,积极呼吁解禁集体自卫权。例如,北冈伸一在讨论钓鱼岛问题时,就曾表示尽管他支持日本政府应当采取“不挑衅、不让步”的态度,从地缘政治角度讲,应解禁集体自卫权。^⑤ 虽然北冈伸一没有直接呼吁使用武力,但他倡导的解禁集体自卫权,其实质也是为日本在海外使用自卫队清除法律障碍。

其次,开展海上自卫队的远洋活动。例如,坂元一哉主张建立从印度洋到

① 秋山昌広「海洋の安全保障と日本」、225頁、226頁。

② 中西寛「2010年代世界と日本の位置——文明論視角から」、71頁。

③ 坂元一哉「米国新戦略と日米同盟」、93頁。

④ 秋山昌広「海洋の安全保障と日本」、『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亜紀書店2014年、第228頁。

⑤ 船橋洋一、北岡伸一「積極的な平和主義と静かな抑止力」、90頁。

中东再到非洲的“西太平洋到印度洋之弧”。他认为,海上自卫队有必要协助东南亚国家打击海盗,并在索马里参加国际反海盗行动,也有必要在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的吉布提建立日本的海外军事基地。^① 秋山昌广主张依靠海上自卫队的力量保障日本的远洋运输安全。他谈到,为了确保日本企业管理下的船舶的安全,传统的海上安全保障把以日本为起点的约1000海里的航路作为对象。当前,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将印度洋、阿拉伯海也考虑进来……尽管对日本来说,北印度洋、南印度洋、东亚、大洋洲都很重要,但最关键的还是北印度洋、东亚的海上航道。日本已经为反恐(基地组织)作战和反海盗作战向海外派遣舰船,并参与确保航道安全等海上安保行动,仅仅依靠其他国家确保相关海域的安全的想法是不可取的。^②

综上所述,日本学界对自卫队的建设与活动、联合军事训练与武器输出、海外军事活动的呼吁,既是出于保障日本海洋安全的现实考虑,也为日本未来参与地区海洋秩序的构建、实现海上力量的全球扩张奠定了武力基础。

三、日本海洋战略与地区秩序构建

面对“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中的“权力转移”,很多日本学者认为日本要实施海洋战略,就必须发挥自身的特色与优势,积极参与地区秩序的构建。其中,一些学者从地缘政治的视角,认为日本应当与西太平洋、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联合起来;也有一些学者从相互依存的视角,倡导地区合作。

(一) 基于地缘政治构建地区秩序

从地缘视角出发思考国家发展战略在日本由来已久。从江户时代后期政治学者林子平的《海国兵谈》,^③到明治时期海军将领、战略家佐藤铁太郎吸收马汉的“海权”思想所撰写的《帝国国防史论》,^④均是从日本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出发,强调海洋对日本国防的重要性。战后,高坂正尧等学者又通过反思日本的战败,断言日本应建立海权、与海洋国家为伍。^⑤ 世纪之交,美国地缘战

① 坂元一哉「米国新戦略と日米同盟」、93頁。

② 秋山昌広「海洋の安全保障と日本」、225—226頁。

③ 林子平「海国兵談」、仙台:宝文堂出版、1977年。

④ 佐藤鉄太郎「帝国国防史論」、原書房、1979年。

⑤ 高坂正尧「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0年、177頁。

略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受到日本学界推崇,并影响至今。依据该理论,经济学者川胜平太提出了“21世纪日本的国土构想”:从鄂霍次克海开始,经过日本列岛,包括朝鲜半岛、中国内地的东部地区和台湾、东海、南海,直到东盟的大部分区域和澳大利亚的北部,是“海洋丰饶半月弧”地带,日本在其中处于关键位置;该地带将在21世纪发挥主导作用,日本也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开拓自己的海洋国家道路。^①换言之,未来海洋日本的路线就是和与西太平洋同经度的国家与地区进行联合。^②

近几年,“地缘政治学”继续受到日本学界的追捧,并被广泛运用于日本国家战略的思考。例如,坂元一哉运用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分析当前国际环境和未来日本的国家战略。^③秋山昌广认为,当前的权力中心转移到了以太平洋、印度洋为中心的亚洲海洋,也就是地缘政治学所指的“亚欧大陆边缘地带”。为此,日本应当谨慎应对台湾,并与东南亚国家、印度洋地区的国家展开合作。^④一些学者甚至将地缘政治视角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以此考察日本的海洋战略与亚太地区秩序。例如,中西宽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出发,认为日本应当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多边秩序的建立,特别是与东南亚国家、太平洋岛屿国家、印度进行合作。同时,他还指出,台湾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又与日本同样拥有自由民主体制与市场文化,因此日本也应当与台湾建立伙伴关系。^⑤

川胜平太与坂元一哉等学者所设想的海洋合作对象存在两个显著的差异。第一,前者的构想中包含了中国大陆,后者却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外。在川胜平太所提出的“21世纪日本的国土构想”中,中国大陆是日本海洋合作的对象之一;而坂元一哉、秋山昌广、中西宽所设想的日本海洋合作,已经完全排除了中国大陆,仅保留了中国台湾地区。第二,川胜平太所提出的“21世纪日本的国土构想”仅包括西太平洋的国家和地区,而坂元一哉等学者还在此基础上将印度洋地区囊括其中。

从动机来看,这些学者倡导日本发展与西太平洋、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既有共同开发海洋的合作又有针对中国的对抗意涵。首先,共同推动海

① 川勝平太「文明の海へ:グローバル日本外史」、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99年、12—13頁。

② 川勝平太「海洋日本の進路」、伊藤憲一「21世紀日本の大戦略」、東京:日本国際フォーラム出版、2000年、35—39頁。

③ 坂元一哉「米国新戦略と日米同盟」、79—95頁。

④ 秋山昌広「海洋の安全保障と日本」、204—230頁。

⑤ 中西寛「2010年代世界と日本の位置——文明論視角から」、70—71頁。

洋合作。“中东——马六甲”航线不仅对日本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更具有战略价值。为了保障海洋航道安全,一些学者主张,日本应与沿岸国家共同开展反海盗行动、携手经营海洋,联合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国家,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等方式援助菲律宾等国家。^①其次,共同对抗中国。这种观点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1) 确保海上通道安全。他们认为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南海是日本运输资源与能源的海上生命线,对确保日本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然而,这一地区既有海洋领土争端,又有围绕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划定而产生的纷争,^②因此,他们呼吁日本与航道沿岸国家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2) 解决中日海洋领土争端。为此,他们呼吁日本政府拉拢那些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东南亚国家共同对抗中国。他们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提出“尖阁诸岛^③问题事关日本的安全保障和国家利益,是极为重要的问题”。^④日本要在东海海域守护“日本的领海”;^⑤鉴于“今天的南海就是明天的尖阁群岛^⑥”,^⑦日本应当联合东南亚国家,共同对抗中国。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者反对运用地缘政治理论分析国际政治局势,船桥洋一就是其中之一。2014年,时任“日本重建基金会”理事长的船桥洋一与时任国际大学校长、安倍晋三首相的智囊^⑧北冈伸一共同参加了由日本期刊《外交》编辑部策划的讨论会,两位学者针对当前地缘政治学在日本“复兴”的情况,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北冈伸一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并非按照同一规则运行,因此必须考虑到国家风险与地区风险,地缘政治学的思考非常必要。船桥洋一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不论技术如何进步、全球化如何发展,地理与历史均不会改变。完全不考虑或过多地考虑地理和历史因素,不利于有效地开展外交活动。他援引乌克兰危机进行论证,认为正是地缘政治学导致了欧洲国家的误判,进而引起了恶果。对此,北冈伸一以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为例进行反驳,强调地缘政治学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要和平解决纠纷,使地球范围内有法可循,必须有深远的战略作为指导。因此,他

① 坂元一哉「米国新戦略と日米同盟」、92頁、93頁。

② 秋山昌広「海洋の安全保障と日本」、219頁。

③ 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笔者注。

④ 秋山昌広「海洋の安全保障と日本」、215頁。

⑤ 山田吉彦「日本国境戦争、日本の海をめぐる攻防」、ソフトバンク新書、2011年、200頁。

⑥ 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笔者注。

⑦ 山田吉彦「山田吉彦氏、今日の南シナ海は明日の尖閣だ」、「産経」、2014年1月27日。

⑧ 2007年4月—2008年8月,北冈伸一曾担任“关于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础的恳谈会”代理主席。

认为地缘政治的思考非常必要。^① 尽管在这次辩论中双方难分伯仲,然而从当前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那些微弱的反对声音并没有阻碍地缘政治学被很多学者采用,成为他们思考日本海洋战略的理论依据。

实际上,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支,地缘政治学理论在国际社会一直饱受争议。汉斯·摩根索就曾指出,地缘政治学“将地理因素抬高到绝对地位,认为地理决定国家的权力,因而也决定着国家的命运”,^②因而,他将地缘政治学视为伪科学。当前,日本知识精英推崇地缘政治学,赋予地理因素以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不仅易于产生战略误判,也无益于日本海洋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二) 基于相互依存理论构建地区秩序

除了地缘政治,也有一些日本学者从相互依存的角度进行思考,倡导地区合作。早在21世纪初,东亚共同体评议会议长伊藤宪一、时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田中明彦等学者积极倡导地区合作,呼吁建设亚洲共同体。田中明彦倡导建立东亚海洋安全保障协作机制:针对东亚地区海洋中出现的海盗问题及未来有可能发生的恐怖主义威胁,倡导建立包括共享海洋情报、共同训练在内的机制。^③

近几年,一些日本学者继续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山本吉宣认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际体系处于由单极向多极(或两极)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可能和平完成,也有可能产生纷争。在当今东亚乃至亚太地区,随着经济相互依赖的发展,经济体系的稳定是各国的共同追求与共同利益。^④ 在此认识基础上,一些研究者进而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例如,原拓殖大学客座教授冈田充就表示赞同台湾交通大学陈光兴教授的观点,主张建设“东亚共同体”,消除领土争端,共同管理。^⑤ 山田吉彦也呼吁,日本应当联合韩国、菲律宾等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国家,建立“海洋亚洲共同体”。^⑥

① 船橋洋一、北岡伸一「積極的な平和主義と静かな抑止力」、91—93頁。

②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肯尼思·汤普森、戴维·克林顿修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徐昕、郝望、李保平译,王缉思校,第196—197页。

③ 田中明彦「東アジア共同体の課題と日本の針路」『東アジア共同体と日本の針路』、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5年。

④ 山本吉宣「パワースフトのなかの日本の安全保障」、40頁。

⑤ 岡田充「国家主権を相対化する契機に」、「領土問題」の論じ方、岩波書店、2013年、31頁。

⑥ 山田吉彦「日本国境戦争、日本の海をめぐる攻防」、ソフトバンク新書、2011年、167—170頁。

一些学者将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剥离开,倡导日本政府建立与中国的“协作”关系,即在经济领域的协调关系与在安保领域的竞争关系。例如,山本吉宣等学者认为,虽然如今中日经济关系的增强为双方的协作提供了契机,但在安保方面,日本仍需要增强防卫能力、强化日美同盟,协助美国共同遏制中国。^① 这种观点把经济问题与安保问题分离,既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又倡导安保领域的遏制战略,在当前日本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实际上,这种观点将中日在政治、安保领域的关系视为“零和博弈”,却期待双方在经济领域保持密切的合作,最终将损害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进而对“亚洲共同体”的建设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

四、日本在国际海洋合作中的角色

2010年以来,日本学界关于海洋战略实施区域的讨论也有了新的进展:不仅强调在西太平洋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海洋合作,还倡导在印度洋、北冰洋等地区参与海洋合作与开发。总体来看,很多学者认为日本在西太平洋海洋国家的合作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在印度洋、北冰洋地区的合作中应发挥积极参与者的作用。本部分将按照不同地区,对日本学界关于国际海洋合作的讨论进行分析。

(一) 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者

日本学界对西太平洋地区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明治维新时期,西太平洋的东南亚地区就受到恒屋盛服、志贺重昂等学者关注,他们倡导“南进论”,主张日本加强对这一海上战略要地的控制。从这时起,西太平洋地区就成为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重点。在大正时期,日本学者对东南亚研究的兴趣持续高涨,其中,以经济“南进论”者、日印协会理事副岛八十六所著的《帝国南进策》、松本敬之所著的《南方帝国论》最具代表性。冷战后,经济学者川胜平太又提出了“21世纪日本的构想”,把朝鲜半岛、中国内地的东部地区和台

^① 山本吉宣「パワーシフトのなかの日本の安全保障」、50—51頁。

湾、东海、南海,直到东盟的大部分区域和澳大利亚的北部囊括其中,^①主张日本在“西太平洋联合”中发挥主导作用。可见,日本学界对西太平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近几年来,随着中日海洋领土争端的升级,日本学界也继续保持着对西太平洋地区的高度关切。

1. 东海。在东海区域,重视台湾、加强与台湾的合作成为很多日本学者的共识。首先,一些学者从地缘政治角度强调台湾对日本的战略意义。中西宽指出,台湾位于日本的西南方向,其地缘政治地位对日本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对日本统治有记忆的一代人已经在台湾逝去,但这一地区的文化仍(与日本)存在紧密联系。以此为基础,日本应当与台湾建立伙伴关系。”他还指出,“台湾周边地区的安全保障秩序应当作为地区的课题予以检视”。^② 东海大学海洋学部教授山田吉彦也强调,日本要在东海海域守护“日本的领海”,台湾是关键,应当建立更加亲密的日台关系。^③

其次,从权力制衡的角度强调台湾对日本的战略意义。在台湾当局提出“东海和平倡议”时,天儿慧教授指出,台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着对话的可能性。他建议日台以和平、互惠、共同开发为目标,采取积极行动。他也强调,“日台联合的形成可能引起中国的警惕。围绕尖阁诸岛^④问题,台湾作为‘参与者’介入,一旦台日之间达成一致意见或采取具体的行动,就可能导致局势出现巨大的变化”。^⑤ 正如东京大学松田康博教授指出的那样,“紧密、稳定的两岸关系,甚至是更极端的情况——统一,将是那些关心权力平衡的日本人的噩梦”。^⑥

可见,日本学界强调台湾的战略价值,强调加强日台合作、密切日台关系,不仅是基于解决钓鱼岛领土争端等具体问题的考虑,也有利用台湾制衡中国大陆的意图。

① [日]川胜平太:《西太平洋联合论》,载《21世纪日本的前进道路:第26期防卫讨论会演讲集》,东京:社团法人队友会2000年,第304页。转引自初晓波:《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

② 中西宽「2010年代世界と日本の位置——文明論視角から」,70頁。

③ 山田吉彦「日本国境戦争、日本の海をめぐる攻防」,ソフトバンク新書、2011年、200頁。

④ 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笔者注。

⑤ 天兒慧「キーワードは「現状維持」」、孫崎享編「検証尖閣問題」、岩波書店2012年、115頁。

⑥ 2014年9月15日,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参加题为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China, Taiwa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研讨会回答提问时的讲话。<http://csis.org/event/japanese-perspectives-china-taiwan-and-cross-strait-relations>。

2. 南海。很多日本学者倡导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洋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首先,一些学者把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置于国际秩序的变动中进行分析,指出东南亚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相连接的战略要冲,近年来围绕南海与东海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之争不断。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通过既存的霸权国美国与新兴大国中国的博弈,在亚洲地区形成“美中共同管理体制”将是东南亚国家不希望看到的;相反,美中之间的对抗激化甚至导致如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并非东南亚国家所愿。无论哪一种情况,东南亚诸国都难以避免受到大国关系影响的命运。^①

其次,一些日本学者从地区局势入手进行分析,呼吁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政策提案委员、拓殖大学客座教授矢野义昭在《日本战略论坛季刊》撰文,指责中国欲在西太平洋建立霸权。他不仅批评中国战略的基本概念中充斥着地缘政治学色彩,还认为中国在地理上三面由大陆包围,因此是大陆国家。考虑到中国的地缘政治条件、历史、经济、军事成长等因素的平衡,中国想在西太平洋建立海上霸权将不会顺利……中国追求地区霸权将对今后世界秩序的稳定造成危险的挑战。^② 基于上述理由,一些学者指出,日本作为东盟国家紧密的经济伙伴,同时也是在亚洲地区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当美国实力衰退时仍旧提供支持的最重要的国家。因此,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安全保障方面,必须充分发挥日本对中国的牵制作用,^③日本也应当在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二) 印度洋地区的参与者

作为日本“海上生命线”(中东—马六甲)的途经之地,印度洋地区很早就受到了日本的关注。近几年,随着印度作为新兴国家在国际舞台日益崭露头角,很多日本学者呼吁日本与印度洋地区的国家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田中明彦认为,“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太平洋曾被称为成长之海;而在21世纪的最初25年里,印度洋也已成为成长之海”。从2007年安倍晋三访印时发表

① 菊池努「パワーシフトと東南アジア」、「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亜紀書店、2014年、第189頁。

② 矢野義昭「中国の覇権主義と海洋戦略」、「日本戦略研究フォーラム季報」JFSS quarterly report (61), 28—34頁。

③ 菊池努「パワーシフトと東南アジア」、「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亜紀書店、2014年、第189頁。

的“两洋交汇”演说到2013年的安倍演说，“印度洋在日本外交中的位置已经被充分印证”。^① 秋山昌广认为，日本应进一步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当前的印度将目光投向海洋，海军力量增强。日本应与具有相同价值观且正在向海洋大国迈进的印度建立“向同盟关系无限接近的战略伙伴关系”。^②

不仅如此，印度洋还被一些学者视为连接日本与非洲国家关系的纽带。田中明彦指出，“一旦印度洋进入了日本的外交视野，它的对岸就是非洲。日本已正式进入了非洲外交时期”。如今，非洲已经成为日本外交的舞台。^③ 为了引起日本各界对非洲的重视，外务省主办的刊物《外交》在2013年刊出了特集《日本战略外交的死角：非洲》，^④对日非合作进行讨论。当前，如何以印度洋为媒介推动日本与印度等国的海洋交流与合作，进而发展与非洲国家的海洋经济、海洋军事合作已经成为日本学界海洋战略研究的新热点。

（三）北冰洋地区的参与者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与人类技术的进步，近年来北极地区的开发引起了日本学界的关注。有学者提出，日本应当参与开辟北冰洋航路、利用北极资源的合作。秋山昌广在《外交》杂志撰文，密切关注俄罗斯的北冰洋战略，特别是2000年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军事活动的复苏。他把日本在北冰洋的战略目标排序如下：北冰洋的航路利用、北极圈的资源开发、当地的环境保护。首先，“关于北极航路，最重要的就是确保海上航线的安全。从现实的角度判断，必须与俄罗斯维持良好的军事关系”；其次，在日本参与北极圈资源开发的情况下，参与当地的安全保障也至关重要。最后，日本应积极参与北极评议会的活动，在北极环境保护与调查、勘测、研究中发挥作用。^⑤

综上所述，按照日本学者的设计，未来日本的海洋合作将以西太平洋地区为基础，并逐步向印度洋、北冰洋地区拓展，建立从东北亚向东南亚、南亚、中东、印度洋岛屿、非洲、南太平洋岛屿、中南美洲、北约、北极圈等国家和地区扩展的海洋合作网络，覆盖大西洋以外的全球三个大洋。依据这一规划，日本将

① 田中明彦「アフリカ——日本外交にとっての課題」、《外交》Vol. 19、2013年、10—16頁。

② 秋山昌広「海洋の安全保障と日本」、《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10年のパワーシフト》、亜紀書店、2014年、228頁。

③ 田中明彦「アフリカ——日本外交にとっての課題」、《外交》Vol. 19、2013年、10—16頁。

④ 《外交》（「特集：日本戦略外交の死角アフリカ」）、Vol. 19、2013年。

⑤ 秋山昌広「北極圏めぐる安全保障の課題」、《外交》Vol. 22、2013年、20—26頁。

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合作中逐渐发挥主导作用,并深入拓展在印度洋的影响力,积极参与北冰洋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活动。

五、理论特点与研究趋势

(一) 关于海洋战略研究的理论特点

基于以上对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当前日本海洋战略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流派——现实主义流派与自由主义流派。具体而言,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现实主义流派,又可细分为地缘政治理论学派和权力转移理论学派,自由主义流派主要以相互依存理论为代表。

第一,地缘政治理论是当前日本学界海洋战略研究的主导性理论。从高坂正尧到川胜平太,再到中西宽、坂元一哉等,地缘政治理论对日本的海洋战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不仅左右日本学界对日本海洋战略的思考,还影响到他们对国际关系、国家战略等的考察。确实,无论是在国际关系的历史还是现实中,地理是国家权力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权力所能依赖的最稳定的因素,^①深刻影响着国民的性格与精神特质。在学术研究中重视地理因素对国家行为、国家战略的影响原本无可厚非,然而以地缘政治学理论为工具,过度强调国家之间的差异甚至夸大“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对抗,不仅在逻辑上存在问题,也将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一旦日本学界广泛利用地缘政治理论分析当前亚太地区局势,过度强调国际局势的严峻程度将带来巨大的风险:一方面,可能导致地缘政治学再度沦为国家战略的工具;另一方面,增加了未来日本确立进攻型海洋战略的风险性,易于导致地区“安全困境”,无益于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

第二,权力转移理论作为近期才被应用于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理论,其影响正在迅速加大。这不仅反映了日本学界对海洋安全保障的思考,还体现了他们对变动中的地区秩序与全球秩序的观察及对未来权力制衡的展望。目前,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将地缘政治理论与权力转移理论结合起来,综合观察当前的亚太地区局势。这反映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

^① 韩爱勇:《在权力政治与自由主义之间:冷战后东亚秩序的理论范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74页。

风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学界对华疑虑上升。然而,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曾指出的那样,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原因及国际体系的变迁是国家之间权力增长的不平衡”。^①如果按照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将中美关系视为全球范围内新崛起的追赶国与既存霸权国之间的关系,将中日关系也视为地区范围内新崛起的追赶国与既存霸权国之间的关系,那么,将很难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尽管权力转移理论不失为一种观察国际秩序变革的视角,但过度依赖权力转移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进而指导外交政策,也难免会有失偏颇。

第三,相互依存理论对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影响曾经烜赫一时,但如今影响有限。从21世纪初很多日本学者强调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的相互依存,以及由此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饱满热情,到如今倡导相互依存的学者形只影单,自由主义理论对日本学界的影响正在减退。当前一些学者所倡导的“海洋亚洲共同体”,尽管试图加强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甚至亚太地区诸多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合作,但在中日关系上,他们仅承认中日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主张在安保领域遏制中国,甚至还试图通过“海洋亚洲共同体”对抗、制衡中国。由于这些学者在对待所谓的“海洋”国家与对待中国时不能秉持一贯的理论主张,因此,他们并非相互依存理论的真正拥护者。

地缘政治理论、权力转移理论,抑或是相互依存理论?一个学者究竟运用何种理论框架探讨当前和未来亚太地区秩序,不仅将影响其对国际秩序、地区秩序的思考,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的政治思潮。在当前日本学界海洋战略研究的理论争鸣中,地缘政治理论、权力转移理论影响甚广,而相互依存理论势单力薄,反映出当前日本国内现实主义力量的鼎盛与自由主义力量的衰弱。

(二) 海洋战略的研究议题与方法

总体来看,当前日本学界对海洋战略的研究,议题非常广泛,但研究方法相对较少。

第一,日本海洋战略的研究议题广泛。从领域来看,涉及海洋军事、海洋经济、海洋环境等多个方面;从范围来看,涉及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等多个

^①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94.

海域;从时间来看,既有对历史的回顾,如对钓鱼岛历史的考察,也有现实的分析,例如,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日本应当如何调整日美关系、日中关系及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等。

第二,研究理论与方法相对较少。首先,政策性研究较多,理论性研究较少。尽管当前日本海洋战略研究领域存在着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鸣,但无论是地缘政治理论、权力转移理论还是相互依存理论,都是作为分析海洋战略、海洋政策的理论框架被加以运用。这些研究大都是沿用现有理论进行政策分析,而通过海洋战略研究寻求对现有理论突破的努力相对较少。其次,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目前,运用理论,结合日本或其他国家、地区在海洋领土、海洋航运等方面遇到的现实问题,通过案例分析、比较分析等定性分析方法,得出采取结盟或是遏制政策等结论的定性研究较多;相反,在当前日本学界的海洋战略研究中,通过搜集大量数据,运用计量统计和建立模型等方法得出结论的定量研究较少。

(三) 研究海洋战略的团队

当前,日本学界的海洋战略研究者具有一些鲜明特点,主要体现在人员构成、协作模式等方面。

第一,从人员构成来看,研究者来源多样、年龄跨度较大。(1) 研究者来源多样化。在目前海洋战略的研究者中,不仅有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具有扎实的知识基础与丰富的研究经验的专家,如浅野亮、坂元一哉、中西宽等;还有很多具有长期一线工作经验的退役军官、退職高级公务员等。例如,孙崎享是外交官出身,历任日本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驻伊朗大使,后来又担任防卫大学教授。这些曾经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员,不仅对海洋战略、海洋政策有着更直观的认识,而且在外交、防卫等相关部门积累了丰富的人脉,易于开展研究工作,也易于将其成果转化为现实政策,从而为制定日本海洋战略与海洋政策创造了便利条件。然而,这种情况也导致了一些弊端。在当前日本海洋战略的研究中,现实主义观点占主流、自由主义观点势微的情况,或许就与很多研究者的从军、从政经历不无关系。(2) 研究者年龄跨度大。在这些研究者中,既有60、70岁的学界泰斗,也有40、50岁的中年骨干,还有30岁左右的青年新秀。这样的年龄分布,不仅有利于为海洋战略研究提供较为多样化的思路,也有利于学术研究的传承与创新。

第二,从协作模式来看,知识精英在海洋战略研究过程中的团队配合非常密切。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高坂正尧等学者主要是以个人为单位独立、分散地进行战略研究的话,那么,如今的日本海洋学者则多以智库为依托进行研究,具有学者和智囊的双重身份。比如,东海大学海洋学部教授山田吉彦,就曾兼任新《海洋基本计划》的提出机构——海洋政策研究财团(OPRF)^①的客座研究员。北冈伸一也曾兼任安倍晋三的智囊机构“关于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础的恳谈会”的代理主席。学者与智库的合作,有助于学者通过所在智库的平台来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形成统一的、足以引起日本政府重视的研究成果。随着学者与智库合作的逐步深入,也出现了一些学者在高等院校与智库之间流动的情况。例如,田中明彦、北冈伸一就曾先后担任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理事长职务。

(四) 海洋研究的难点和增长点

从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海洋战略研究的新动向,可以发现其研究的难点与未来的知识增长点。首先,未来日本学界海洋战略研究的难点,主要在于如何突破现有理论的窠臼。通过对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海洋战略研究的梳理与分析可见,地缘政治学理论、权力转移理论、相互依存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日本学界分析海洋战略的理论框架,既有国家层面的因素,也有国际体系的因素。从国家层面来看,本国的地理位置、历史进程,以及当前国内的主流政治思潮均会对学界的研究视角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国际体系层面来看,当前国际秩序的变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者的理论视角。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如何突破现有理论的窠臼,用新的理论框架推动海洋战略研究,将是未来海洋战略研究发展的一大难点。

其次,日本学界海洋战略研究的知识增长点,主要集中在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方面。从研究议题来看,未来海洋战略研究可以开辟新的领域作为研究课题,如通过探讨欧洲国家在海洋领域的冲突与合作、欧洲国家海洋战略的发展经验等,反思和平解决海洋领土争端、推动地区海洋合作的有效途径;从研究方法来看,在未来的海洋战略研究中,可以进行交叉学科研究,也可以采取

^① 2015年4月1日,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与笹川和平财团合并,合并后的财团沿用“笹川和平财团”的名称,原“海洋政策研究财团”的活动由笹川和平财团海洋政策研究所继承。

定量研究等方法。这些议题与方法,将在海洋战略研究领域孕育出新的知识增长点。

结 语

在当前日本海洋战略的研究中,存在着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流派。前者以地缘政治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为代表,影响日益广泛;后者以相互依存理论为代表,势力逐渐衰落。这种情况,反映出当前日本国内现实主义力量的鼎盛与自由主义力量的衰弱。

本文聚焦于2010年以来日本学界在海洋战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中国崛起与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日本海洋战略中的武力建设、日本海洋战略与地区秩序构建、日本在国际海洋合作中的作用等四个议题进行梳理。在分析中国崛起与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的过程中,发现权力转移理论得到很多日本学者的青睐,影响日益扩大;在分析日本海洋战略中的武力建设时,发现很多学者倡导加强自卫队的建设与运用,增加联合训练和武器输出,积极开展海外军事活动;在分析海洋战略与地区秩序构建这一议题时,发现存在地缘政治理论与相互依存理论等视角,前者成为主导性理论,影响广泛,后者风采大不如前,影响有限;在分析日本在国际海洋合作中的角色时,发现很多学者呼吁继续发挥日本在西太平洋海洋合作中的主导作用,并主张在印度洋、北冰洋这两个地区加强外交活动,积极参与海洋合作。

未来日本将制定怎样的海洋政策,又将如何调整海洋战略?这将取决于哪种理论观点在日本海洋战略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学界的研究为这些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未来日本究竟将如何建设“海洋国家”?人们将拭目以待。

from ordinary people to the “net uyo” reflects the split of Japanese society.

Maritime Strategy Studies in Japan: Core Issues and

Research Trends *Zhu Xiaoqi* (80)

The rise of China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maritime strategy studies. It impacts Japanese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military forc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gional order, and the Japanese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operation. The coexistence of realism and liberalism, the two incompatible approaches, is the main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aritime strategy in Japan. In details, geopolitics dominates this field.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ttracts the academia. Interdependence theory which used to be the most popular theory declines. Those studies have profoundly impacted Japanese policy-making and its implementation of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ARTICLES

The UN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rotecting Mechanism and China's

Participation *Luo Yanhua* (103)

The UN has contributed to establishi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 since 1945.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stipulates the principle of human rights.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has proposed the standards of human rights and expanded its connotations. The UN protect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by its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system.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by higher standards, the UN adjusts its specialized agencies to fit the progress. China was the first signatory state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 participated in drafting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as well. China contributed to stipulating the standards of human rights, to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to expanding the rights' connotation. Although China's particip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ies is a process from discretion